

政府新闻学译丛

主 编：叶 皓 方延明

布莱尔时代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



南京大学出版社

政府新闻学译丛

0140 41/52

主

I561.65
101

布莱尔时代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

【英国】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著

【英国】理查德·斯托德 整理

张 萍 秦 楠 孙晓云 译



北航

C1731039



南京大学出版社

I561.65

10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 / (英)
坎贝尔 (Campbell, A.) 著; 张萍, 秦楠, 孙晓云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2

(政府新闻学译丛 / 叶皓, 方延明主编)

ISBN 978-7-305-07350-2

I. ①布… II. ①坎… ②张… ③秦… ④孙… III.
①日记—作品集—英国—现代②英国—现代史—史料—
1994~2003 IV. ①I561.65②K561.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3196 号

ALASTAIR CAMPBELL AND RICHARD STOTT

THE BLAIR YEARS

Copyright © 2007 by ALASTAIR CAMPBEL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RANDOM HOUSE GROUP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版人 左健

丛书名 政府新闻学译丛
主 编 叶皓 方延明
书 名 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
著 者 [英] 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整 理 者 [英] 理查德·斯托德
译 者 张萍 秦楠 孙晓云
责任编辑 王其平 编辑热线 025-83593947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47.25 字数 847 千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350-2
定 价 80.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l.ptt.js.cn(编辑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政府新闻学译丛》总序

叶 皓

现代社会,媒体潜移默化地根植于人们的生活和世界的每个角落,在反映世界的同时又在塑造世界。媒体的地位日益提升,政府与媒体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需要借助媒体,这在全世界都成为一种趋势,并且这种趋势还将随着媒体的发展不断得到深化。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媒体事件,折射出政府应对媒体方面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提高政府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现实课题。但以往国内的各个学科中,公共关系学从社会组织、企业的角度来研究应对媒体、开展公关的技巧;新闻学与传媒产业联系紧密,定位于新闻专业人员的培养;传播学主要研究传播的概念、理论、方法,以及不同的传播领域、传播行为。它们都没有站在政府的角度,专门针对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开展研究。我们在国内首先提出建立政府新闻学学科,就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以超越传统学科的视野,去研究中国政治生活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西方国家新闻传播业发达,政府与媒体的博弈有着长久的历史,在政府应对媒体领域的实践与研究都远远走在我们前面。

在实践方面,正确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和技能,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官员从事公共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养。正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所言:我们今天的大部分工作量,不管是按重要程度计,按时间计,按精力计,除了最核心的决策之外,其他几乎都是在和媒体打交道。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与媒体的不断博弈中,逐渐掌握娴熟的操控媒体的方法,形成一套应对媒体的机制。美国政府官员普遍具有强烈的媒体意识,将媒体作为政治营销、新闻执政、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时刻防范受到媒体的攻击。他们吸收传播学研究成果,运用拟态环境、议程设置和框架分析等专业理论,指导与媒体打交道的活动;建立专门传播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等管理部门和美国之音等媒体,处理媒体事务,操控新闻报道;借助传媒专业力量,雇用公关、广告等专业人员和公关公司,开展各种政府公关活动;采取各种专业手

段,包括聘请枪手、故意泄密、制造新闻、公关媒体、民意测验、政治施压,让媒体和记者成为自己的工具。

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尼模和可斯指出:“很少人是从亲身经验认识政治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政治现实是经过大众传媒及群体传播的中介而出现。”因此,政治与媒体的关系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由此产生的政治传播研究,在美、英等国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美国为代表的政治传播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传播的效果和行为,研究政治对传播的控制与影响;欧洲的批判传播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大众媒介政治经济学批判。目前,美英不少大学新闻学院已开设政治传播学博士专业,有的大学还设有政治传播学研究中心。

面对信息公开的要求和全球传播的大背景,我国政府亟待提高应对媒体、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特别是要在国际传播中通过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为此,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是必不可少的。《政府新闻学译丛》的编辑出版,正是要通过翻译、引进国外优秀研究成果,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观察视角和研究思路。所选著述,基本上都是在外国已广为流传,受到公众好评的佳作。虽然西方学者的研究采用的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的、定性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是在一定的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不能涵盖政府应对媒体的各个领域、各种情况,但我们相信,这些他山之石,一定能帮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胸襟,去建设一个民主、文明、富强、和谐的中国社会。

《政府新闻学译丛》

编 委 会

主 编：叶 皓 方延明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卜 宇 方延明 左 健 叶 皓

李希光 吴锦才 陈昌凤 胡智峰

段京肃 曹劲松

序 言

1994年5月12日，工党领袖约翰·史密斯心脏病发作。我是从约翰的新闻官员希拉里·考夫曼那里得知此消息的。当时我正在前往《今日》报社的路上，我是该报的助理编辑。从希拉里说话的语气，我听出约翰即使不是已经去世，也很可能是在弥留之际。我转向议会下议院，在那里，约翰的密友兼同事杰克·坎宁安，含泪向我确认了消息。我沉浸在悲痛中，漫长的一天都在书写录制悼辞。我另外有两个特别强烈的直觉。第一，托尼·布莱尔将成为工党的下一任领袖。第二，尽管布莱尔从没和我讨论过这种可能性，而我将为他工作。

甚至在约翰去世的前一天，一项旨在调查公众意见的民意测验显示戈登·布朗比布莱尔更有可能成为下届工党领袖。但是这项民意测验难免是建立在“假如”的基础之上的。当时没有人想到约翰·史密斯会在那个五月的早晨去世。我们都指望他率领工党进入下一届大选，与约翰·梅杰所领导的执政党保守党决一雌雄。当这个“假如”突然间变成直接的现实问题时，人们的情绪可能会产生变化。果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人曾经以为想当然的事情——布朗将接替史密斯——遭到了质疑，人们突然间普遍地认为布莱尔具备工党最需要的素质：他能够帮助工党摆脱大选连续失败的命运。

整整一天，我匆忙地奔走于议会下院的办公室和报道议会消息的电视台、电台所在地米尔河畔4号之间，我小心翼翼地回避着有关继位的问题。然而当英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直截了当地问我，我认为谁将接替约翰时，我说是托尼·布莱尔。

我的记忆力不好——这是我记日记的原因之一。但我清晰地记得与布莱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1983年他刚被选入议会，我的当律师的小舅子就跟我说留意这个来自塞奇菲尔德的新议员。我听说他很聪明、风趣、极富魅力。他绝非平庸之辈或是普通的工党下院议员。所以，当我看到他进入议会下议院议员大厅时，作为《镜报》记者的我走上前作了自我介绍。他穿了一套很不合身的米色西装，脸上洋溢着无比灿烂的笑容，这笑容后来闻名

世界。谈论了一小会儿家庭和共同的朋友，话题就转向了我们之后花大量时间一起讨论的主题——工党还需要做哪些事才能赢得权力？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与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菲利普·古尔德和其他的许多人都进行过无数次类似的交谈。我与他们四位有紧密的工作关系，作为政治记者，我从不掩饰自己的立场，古尔德是一位敬业而痴迷的民意测验专家和策略家，曼德尔森开始是竞选活动主任，后来成为下院议员，布朗和布莱尔是他们这一代工党领导人中两颗闪亮的天才明星。

他们在尼尔·金诺克的领导下已经成为活跃分子。在约翰·史密斯手下，布朗和布莱尔的青春活力与史密斯的经验老道被认为是相得益彰，但是他们常常对变革的步伐显得不耐烦。他们不相信政府已经在大选中失败——尽管约翰·梅杰摇摇欲坠，分裂的后撒切尔政府可能在此过程中帮了忙。他们认为反对党必须赢他们，他们不知疲倦地、不停地制定着认为对工党夺回执政党地位至关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之前，布朗一直被认为是资历较深的人物，但布莱尔却丝毫不这样认为。约翰·史密斯死后他们之间位置的颠倒将成为造成两人之间某种相当紧张的关系的源头，这种关系，在之后的日子以及布莱尔整整13年执政期间，有时发挥了创造性作用，有时也有不利的影响。

布莱尔因为处理两次特殊事件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工会事件和犯罪事件。就工会事件而言，作为就业问题发言人，他巧妙地改变了工党针对倒闭商店的政策，从而建立了他的维新派声誉，同样重要的是他展示了不惧怕斗争的精神。在第二件事情上，尤其是在处理利物浦的两岁男孩詹姆斯·伯格被两个少年折磨后谋杀的事件时，他展示了非凡的口才，以左右派政治家都努力采用的方式表达了公民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严惩犯罪，狠抓犯罪的根源”，这句话是他与布朗共同推敲出来的，是他成为影子内政大臣后被引用最多的广播讲话之一。

xi 尽管他擅长与人沟通，但是除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精彩的广播讲话外，布莱尔身上还有许多别的特质。他之所以加入工党是因为工党最能代表他的个人信仰和价值观，舒适、充满关爱的中产阶级成长环境，以及扎根于灵魂深处的基督教信仰培养并强化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但是他担心，除非工党能适应当代的后冷战、后撒切尔时代的世界格局，否则这个党将会僵化至死。所以他总是在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他对现代化的热情最终成为助他成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曾经花了一些时间权衡是否为他工作。我有很好的生活，一个小家庭，一份不错的收入以及蒸蒸日上的广播记者事业，所

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我有好斗的名声,从来都不擅长掩藏自己的感受。我是个有个性的人。我向他坦白了当时的想法:我担心整个自我与人格将隶属于其他人的抱负。我在1986年患过严重的精神疾病,所以担心接受这份工作后,其压力可能再次将我带入非常黑暗而危险的死胡同。

他知道这一切。他说:“如果你不担心,我就没什么担心的。”我问如果我担心呢?他说:“我依然没什么担心的。”

我的生活伴侣菲奥纳,我的父母以及许多朋友,其中包括尼尔·金诺克,都恳求我不要接受这份工作。他们担心它会夺去我的生命,最终导致我讨厌媒体,迁怒于政治家必须承担的那份重担,而政治家是一类难缠的人。他们说对了。有时候这份工作造成了家庭关系的几乎无法容忍的紧张。尽管如此,尽管所有的保守党党员和愤怒的媒体设置了重重阻碍,我依然很高兴担当此任,也感谢他为我提供了这个机遇。由于我的参与,工党由一个失败的党变成一个胜利的党,一个能自如地运用权力促成变革的党。

他的勇敢最终赢得了我。1994年夏天在法国的一条人行道上,他告诉我,在他作为领袖举行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打算宣布修订工党党章的核心条款,即老的第4条款,因为该条款所规定的党应该为之奋斗的经济政策,工党已经不再相信,更不要说追求了。他的勇敢在本书的很多处都能表现出来——他决定要确保深化工党的现代化进程,使其覆盖工党政策的几乎每一个主要方面,以便公众能注意到变革。他认为工会还没有完全理解或面对变革,于是他与工会之间建立了新的“公平而不偏袒”的关系。他不断地推动已经达成协议的经济运作方式,为以后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国内改革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他的勇气还体现在他的竞选技巧上。在马路上,他可能是个恶梦般的人物,他会大惊小怪,烦躁发怒,陷入无休止的、似乎不知所云的循环式谈话中。但是随后他又能迅速决定行动路线,静下心来,展现一个强大的竞选者的气度。

xii

拥有权力后,他很清楚哪些事情在一开始就该优先关注,他的勇气和领导才能又一次被调动起来——他建立了工党的经济实力,向人们展示了现代化的公共服务并不仅仅意味着大把花钱,而是促使他们也能够面对艰难的改革。

从第一次访问北爱尔兰开始,他就毫不动摇地相信北爱尔兰的和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那方面,他显示了无与伦比的胆识和领导才华以及无限的耐心。本书一些页面展示了他在促进英国宪法的现代化方面所表现出的勇气,他认真研究了以往失败的教训,然后设定了自己的策略,在其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的时候,促使政府对地方的权力下放成为现实,而非纸上谈兵。

我们在以下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勇气：他决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特别是科索沃地区的冲突以及非洲和中东问题，他对 9·11 暴行的态度，他应对危机的方法，是的，还有在伊拉克，他明知自己走的道路得不到认可，但依然遵循着既定方针，确信萨达姆·侯赛因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真实存在的。

然而，如果说他能够在大的决策上表现出超凡的勇气，有时候他可能过分轻视了非紧要的问题和决策，从而导致了不应有的损失。相反，在另一些时候，他可能过分担忧一些最终并非很重要的问题，担心别人如何看他以及一些本不该困扰他太久的不足挂齿的人事关系。如今，他的脸皮变得厚了，经验使他变得坚强。当然，他的脸皮并非总是这样厚。

不过，下面这件事也反映了布莱尔的厚脸皮：去年看到他时，我说我打算发表我的日记摘录，特别是重点谈及他离职前后那段时间的日记，他的第一反应并不像类似妄想狂的政治家那样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被一个密友 24 小时不留情面地观察之后，哪些不利于他的事情会曝光。相反，他说：“我希望它能成功，无论怎样，我们在一起时总能开心地大笑。”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经常是由坐在驾驶座位的我的情绪，而不是他的情绪来决定气氛，所以我不能确定我的日记摘录一定会成功，至少不是以我们曾经习惯的方式取得成功。但是我认为布莱尔的乐观精神和通达的心态帮他度过了许多艰难时刻，这就意味着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功了。

xiii

我希望这本书能描述一位拥有巨大的动力和想象力的政治家的全貌，他决心利用其在位的时间做些不寻常的事，从而带来许多重大的变革，使未来更加美好。但它只是一本日记，而非赞美的颂歌。它记录了我在布莱尔领导时期的许多重要时刻的所见所闻、所言所感以及所思所为，并非后知之后明。它记录了美好岁月，也记录了痛苦时光。它记录了压抑，顺利和挫折，分歧与和谐，愉快的和不悦的情绪，通常前者是描写他的，后者是描写我的。

我记得我最早写日记是在孩提时代。当时住在约克郡，我的父亲是个兽医，他在给小猪打针时，大母猪逃离猪圈引起了一场车祸，我父亲因此住进医院。医院在凯利镇，离我家很近，我父亲在住院恢复期，我给他写每日文摘，也就是我的个人日常生活汇报——我吃了什么，在学校做了什么——再加上从报纸体育版抄来的报道。从此，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我都记日记。但是在为布莱尔工作期间，这个偶尔的习惯变成了有意识的决定，我要尽可能近距离地记录一些事件。工作时，我每天记日记，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在当天记录所发生的事件，但从未在过了一两天之后再记录。托尼注意到我在做这件事，他也知道我可能在某个时候发表这本日记，但从未反对过。

对我来说，这本日记具有部分的治疗元素，尽管这些日记摘录只是整本

日记的片段,但是它们依然流露出我时而感觉到的某种强烈的愤怒和挫折感。作为一种修养,我也发现记日记对我有益,它使我将最重要的事情放在首位,帮助我给周围那些经常是杂乱无序的事件整理出个头绪。有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找时间写日记的。但我还是挤出时间了。从1994年夏天托尼·布莱尔第一次请我为他工作起,到2003年秋天我辞去唐宁街职位,我总共写了两百多万字。我不能确定准确的字数,因为我还没有将所有日记完全录入电脑。这里摘录的部分总计三十五万字,大约六分之一。

我的确想全文发表它们,若干年后,可能以编年体形式出四册,每册包含两年的事件:第一册,反对党岁月;第二册和第三册,我们的第一任期;第四册,2001到2003,主要事件包括9·11,伊拉克战争,以及我离任时依然在进行的政府与英国广播公司之间的辩论。离任后的事情我也已经记了日记,包括旨在澄清政府,对国防部科学家大卫·凯利之死进行司法调查的赫顿质询案,以及此后的英国广播公司署长和董事长的辞职。它还包括我回来帮助竞选以巩固我们第三次大选胜利成果的那段时光。不过这本日记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从一个远离中心的位置进行记录。那也同样值得期待。

xiv

本书的重点是布莱尔本人,以及他担任工党领袖的13年间所发生的一些主要事件。2003年我辞职后说过,我不会令他难堪。即使我相信,总的来说他是值得赞许的,然而在像生活日记这样带有强烈的私密性质的文本中,很可能有一些材料被他的敌人用来对付他。但是至少在政治方面,当他的首相职位成为历史而非被媒体分析的第n个普通的政治行为时,任何对他的攻击终将显得软弱无力。在我看来,媒体已经失去了评判当权人物的恰当的角度,或者说媒体缺乏如何看待政治和政治家的责任心,从而也丢失了其对健康的民主的影响力。我想在布莱尔离开前夕发表一些关于他的东西,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我一直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参与到对他的历史评判的首稿写作活动中。这是我为此目标做的第一件事,很多作家和电影制作人都希望我与他们合作,参与到他们组织的关于“布莱尔之遗产”的项目,现在,他们应该明白我为什么拒绝了。我喜欢自己干。

布莱尔离开后,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戈登·布朗,我对他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玛格丽特·撒切尔第一次获得大选胜利的时候,我大学毕业。之后在我成年生活的大多数时候,工党都一直是反对党。目睹了这一切之后,我就拼命工作,想帮助工党重新成为执政党。我近距离地看到了首相工作之不易,我不想让任何承担此任的人难上加难,戈登就更不用说了。他是新工党获胜势力的中心人物,而且是现任首相。正如书名明确指出的,本书要写的人物是布莱尔,而非布朗。

我希望本书能通过一个除了他妻子之外,在该时期与他相处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传递某些关于布莱尔及其时代的信息。事实上,切丽曾经说过,在布莱尔醒着的时候,我与他共处的时间肯定超过他们夫妻相处的时间。

xv 因为众所周知我在写日记,在2003年赫顿司法质询案期间,我不得不将与那些事件相关的日记摘要交付受审。坦率地说,当我在法国度假时收到要求看这些日记摘要的传真时,就像当头挨了一棒。正如第741页(英文版页码,见本书边码)及其后几页所述,首相有时候甚至比我更担心我笔下记录了什么。我们处于政府、首相以及我本人所经历过的危难时期之一的顶点。为了决定将哪些日记摘要交给赫顿审判长,我不得不与王室法律顾问乔纳森·萨姆申坐下来,逐字逐句地将那一段时期的日记过了一遍。那是一个使我精疲力竭的情感消耗过程,曾经让我潸然泪下。最后,我问萨姆申有何想法。作为一个业余的中世纪历史学家,萨姆申说他的第一个相当自私的想法就是希望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人像我这样记日记。

我不知道人们会如何理解这本书。或许我对这些事件和本书发表的整个过程过于熟悉。我知道一些报纸和评论家将抱着既定的观点阅读本书,并从中找出有利于他们证实其偏见的部分。因为是他们犯错在先,所以我不尊重他们,而且我真的没兴趣理会他们的观点。在我删减掉的材料中,许多是关于我与一家24小时连续播报的媒体之间的交涉情况,在我看来,这家媒体使政治辩论和政治本身都变得更荒唐,因为政治家不得不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这样一群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角色并非是传递信息,引发积极的讨论,而是处心积虑地干扰政治家的行动和决策,怀疑他们的动机。这真是令人心痛的讽刺:我们现在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的媒体报道,但是更缺少理解或真正的辩论。

但我还是真诚希望感兴趣的和开明的读者都能从此日记中得到快乐和知识。尽管只是些摘记,我希望它们能说明现代政治的内涵。我希望它们能揭示关于布莱尔、关于领袖、关于一些事件以及受审查的人物的一些情况,而这些,都有助于人们了解英国和英国政治所面临的某些挑战。

我曾经处在很有特权的地位,对本书所应包含的内容一直有很清醒的认识。有一些很私人的对话将永无曝光之日。另有一些可能属于边缘性的对话,包括我所目睹的布莱尔和其他世界领导人之间的对话。因为我们谈论的是处理真正的重大事件的历史人物,我希望有朝一日,这些日记能进入他们的历史全集。但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越界了,由于传播了对话参与者认为在一段时间内应视为机密的细节,我已经转向了不顾他人意见的方向。在多数情况下,我是依靠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也寻求其他人的建议。我尝试

过平衡各种各样的需求:既要公平对待所有相关的人,又要考虑国家利益和
历史的要求,同时也渴望能全面而深刻地描述一个迷人的时代。 xvi

作为前任的政府雇员,我有责任将手稿交给内阁办公室接受审查,这也是一个实例。我对政府不同部门的许多看法也融入了这个过程。

对于那些以前的同事、政策专家或情报官员认为会因本书的出版对英国的国家利益造成威胁的内容,或者有可能违反《国家安全法案》的内容,我都删除了。

不过,我依然相信在此发表的东西是完整的,并希望一些现在被认为不适宜发表的东西将来能呈现在读者面前。

即使我已经删减了一些内容,依然会有人认为,从原则上讲,出版这样一本书就是错误之举。对此,我们实在不能苟同。将来会有许多关于布莱尔时代的描述,历史将自有其评判。我尽可能近距离地、即时地、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一些事件,在我看来,不将部分记述公布于众是不恰当的。这本书和未来的几部书发表后,我打算将打印稿捐给一所英国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研究项目的基础,我相信它将成为大学生研究政治、欧洲、爱尔兰事务、英美关系以及其他学科的资源,因为这些问题在我的日记中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并研究过。

我也希望本书能在以下方面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即在无情的媒体 24 小时关注下的严酷的政治生活,我也希望政治家和其他的决策者可以通过此项研究,了解我们与媒体交涉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益。

这些日记我是记在 A4 纸大小的日记本上或是笔记本上的,偶尔也写在活页纸上。我已经重写的部分,是那些原日记中写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缺少背景知识,或者是那些可能引起司法麻烦以及出版商和编辑认为普通读者要求解释的地方。因为法律原因或者作为审查程序的一部分,我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但我尽量确保不改变当时的意思和情绪。我绝对没有将今天的想法加入过去发生的事件中。我没有察看任何其他录音、报纸或研究资料。这是一本如我所见情形原样展开的事件之记录。

没有什么“可行的办法”,这对于像我这样的控制狂人来说,是一个挑战。随便翻阅一页,你可能找到我很瞧不起托尼的证据,因为你必定会逐渐了解他。浏览另一页的时候,你可能发现我很钦佩他的领袖才能。同样,在某一页纸上,托尼可能对某个同事或某位世界领导持肯定态度,而在其他地方,在不同的场合,他却表达了相反的看法。人们对不同政策领域的观点是发展变化的,所以有时候我和其他人表达的观点可能与我们在其他地方说过的观点、或者今天的看法相矛盾。那不仅仅是日记的本质特征,而且是我 xviii

们生活的现实,无论我们身处政界与否。例如,尽管这里记录了我和彼得·曼德尔森之间发生的很多次口角,但是我依然认为彼得不仅仅是新工党故事中的主要部分,更是我的好朋友。

至于托尼,公平地讲,我们共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我在日记中也记述了一些美好的回忆。但是总的来说,我可以很诚实地讲,在其任职的后期,我比先前更喜欢和敬重他,因为我看到了他优秀的领导素质。我相信英国之所以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国家,是因为自1997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革,而许多特别艰难的改革是由布莱尔推动的。许多让我们夺回权力的改革起先也是由布莱尔发起的。他创造了连续三次赢得大选胜利的记录,这在工党领袖中是前所未有的。这也说明了他与英国公众的关系,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媒体并不真正了解英国公众。

北爱尔兰的进步这件事就足以成为历史的见证。本书多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北爱尔兰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布莱尔拒绝接受这样的情形:即他所领导的国家的一部分将不得不生活在远离和平、接近战争的环境中。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的事件——一个独立的英国银行,一个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选举的市长们,一个创新的议会上议院,重新充满活力的城市,将近100%的就业率,最低工资标准,学校和医院的改革,增加对学校 and 医院的投资,学生人数,尤其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人数的增加,学生人均投入翻番,医疗投入增加两倍,自从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建立以来最大的医院建设项目,犯罪率大幅度下降,保守党现在也认为必须支持的同性恋者的新权利,米诺舍维其的倒台,伦敦2012年奥运会,非洲的进步。正如他一开始所希望的,虽然英国的货币不如欧元强劲,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变得更强大。至于伊拉克问题,我希望下面的书页能够为将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才能解决的辩论增加一点素材。

我也希望人们在阅读本书的同时,能理解我们的政治进程是好的,尽管期间有一些错误。希望人们理解我们为了许多有益的变革而采取的方法。我的这个观点并不时尚,但是对于分别在新闻和政治领域的高层工作过十年的我来说,我对媒体的贬值表示敬意,对政治的发展也表示敬意。

xviii 布莱尔领导下的许多变革都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英国和国际环境,他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让工党的现代化带动英国的现代化,并且基本上以此为中心。但在此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的波折和未曾预料之事,在英国乃至全世界,出现了很多有趣的、复杂的人物和关系。这些摘记展示了他们的风采。没有一枝笔能完整地记录下布莱尔做领袖期间所发生的如此丰富的意义深远、多姿多彩的故事。然而这才是我写的第一章。

鸣 谢

我选择蓝登书屋出版公司出版这本书是缘于我和蓝登书屋首席执行官 盖尔·雷巴克和她的丈夫菲利普·古尔德之间的长久友谊，他们为准备此书所花费的时间几乎与我花的时间一样多。蓝登书屋哈金森出版社的许多人都参与了本书的出版发行工作，我要特别感谢盖尔，苏珊·桑顿，卡罗琳·加斯科因，罗伊娜·斯凯尔顿·华莱士，卡罗琳骑士，夏洛特·布什，萨利·巴拉斯，海伦·贾德，安娜·辛普森，埃里克·希伯德，马克·韩德思莱，迈拉·琼斯，凯瑟琳·福莱和维克·罗宾逊。我也要感谢律师马丁·桑姆斯。感谢有声书籍团队的佐伊·豪斯，埃里克斯·穆尔和凯蒂·布赖尔，他们使锁在录音棚的三天时光比我预想的更愉快。 xix

理查德·斯托特是个非常优秀的编辑，与他合作十分愉快，当年我在媒体工作的时候就与他认识，那时他就在新闻界为托尼工作了。他和我都非常感谢马克·班尼特帮我抄写日记，并且不辞劳苦地修改每一稿。谢谢文学代理人埃德·维克的支持和睿智的建议，感谢他过去和将来对白血病研究会的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埃德的私人助理琳达·范。

谢谢书中写到的人们，他们让我和托尼·布莱尔在一起的时光如此的迷人。感谢托尼，他让我有机会经历我所目击的事件。我要感谢所有在唐宁街与我共事过、反对过我的人。还有许多值得感谢的人值得一提，但是如果我能从中选出一位特别献上我的谢意，这个人就是我的前任私人助理艾莉森·布莱克肖。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我的家人：菲奥纳和我们的孩子，罗里，加拉姆和格雷斯，我的母亲贝蒂，我的兄弟唐纳德和格瑞米，我的姊妹莉斯和菲奥纳的母亲奥德丽。我们大家都感到难过的是我的父亲唐纳德和菲奥纳的父亲鲍勃已经离开我们了。我也要向他们表达谢意，我想如果他们健在，一定也会喜欢这本书。 xx

目 记

政府新闻学译丛

媒体伦理

[英]马修·基兰 编

草根媒体

[美]丹·吉摩尔 著

美国政治中的媒体:内容和影响

[美]戴维·L·帕雷兹 著

布莱尔时代——阿拉斯泰尔·坎贝尔日记选

[英]阿拉斯泰尔·坎贝尔 著

美国总统的信息管理:白宫的新闻操作

[美]马莎·库玛 著

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

[美]道瑞斯·戈瑞伯尔 著